

韩国开化史研究

李光麟 著
陈文寿 译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HONG KONG PRESS FOR SOCIAL SCIENCES

韩国开化史研究

李光麟 著
陈文寿 译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

韩国开化史研究

作 者 / 李光麟

译 者 / 陈文寿

责任编辑 / 木全文

封面设计 / 李 萌

发 行 人 / 韩方明

出 版 者 /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 2 座 1606 室

电话: 852 - 2526 5338

传真: 852 - 2536 9223

电邮: dcom@netvigator.com

dragoncom@21cn.com

排 版 / 龙浩国际交流出版公司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 龙浩中国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1999 年 12 月香港初版第一次印刷

I S B N / 962 - 620 - 027 - 8

定 价 / 港币 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韩 国 学 丛 书

韩国大学学术财团支援刊行

李光麟 著

韩国开化史研究

一潮阁 1999 年

根据韩国一潮阁 1999 年版译出

译 序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的变革,是近代东亚世界在欧美列强冲击下迫在眉睫、生死攸关的历史课题;现代化方案的摸索和实践,是近代中日韩志士仁人为富国强兵而呕心沥血、不遗余力的拼搏历程。惟其如此,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国家早期现代化运动和开化思想家成为历史学家热烈研讨和衷情讴歌的恒久对象。时至今日,我国学术界对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各种谋求民族振兴的改革或革命运动及其思想者和实践者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东瀛日本黑船来航之后以明治维新为核心的现代化运动亦积累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近代朝鲜半岛现代化进程的风云曲折和开化思想家的生涯际遇依然知之甚少,尽管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近代命运极其相似。故此,李光麟先生所著《韩国开化史研究》的翻译出版,不仅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不应有却依然存在的空白,而且还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特别是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和总体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东亚世界的历史演变。

李光麟先生是韩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九二四年出生于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平安南道镇南浦龙冈。一九五〇年毕业于韩国延世大学(原延禧大学)史学科,后获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七年起任延世大学史学科助理教授、副教授,一九六四年转任西江大学文学院史学科副教授,翌年升任教授。一九七二年后任西江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所长、副校长。一九七六年任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一年被遴选为韩国学术院会员(院士)。此外,还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客座研究员、韩国世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和中部大学校长等。现任西江大学名誉教授,韩国学术院会员(院士)。李光麟先生长期潜心探讨韩国近代史,尤以其别具只眼的开化问题研究蜚声学术界。他著作等身,除本书外,还著有:《开化党研究》(一九七三年)、《韩国开化思想研究》(一九七九年)、《韩国史讲座·近代篇》(一九八一年)、《韩国开化史之诸问题》(一九八六年)、《开化派与开化思想研究》(一九八九年)、《开化期研究》(一九九四年)等;另译有:《韩国的独立运动》(一九六九年)、《开化期的韩美关系》(一九七三年)、《韩国改新教受容史》(一九八九年)等。

《韩国开化史研究》是李光麟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关于韩国近代开化问题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一九六九年由韩国一潮阁初版,一九七四年修订再版,一九九九年全面修订重版。凡三十年间,著者孜孜不倦地收集和发掘新资料,参考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结合研究心得,屡次修订和增补,其精益求精的严谨学风和虚怀若谷的学术良心跃然纸上。作为韩国开化史的专题著述,该书备受韩国及各国学术界推崇和广泛引用,被誉为该领域的经典作品。虽然是单篇论文编成的文集,实际上堪称是由各成系列的学术论文,即关于思想、运动、人物等三个方面的系列论文,构成为关于韩国开化史的严密的研究体系。概而言之,各篇论文立论中肯,资料翔实,论断持平,分析辩证,颇具创见且富启发意义。关于韩国近代开化运动和开化思想家,韩国及他国学术界见仁见智,我国学人自会在全面和深入地研究后做出客观的评述。译者在此仅就学力所及和所思赘述几句:

其一,关于研究的视角和对象。在历史研究中,学者所重视的一般是波澜壮阔的变革运动和弄潮时代的风云人物,忽视乃至无视相对平稳的社会演进和缺乏风采的中庸人物。实际上,较之往往不无过正色彩的运动和豪杰,恰似微波不起之潜流的凡夫俗子及其活动的长时段累积或许更能平稳地推动历史车轮的滑行,他们在本质上同样是洋溢着激情和生命力的历史学对象。在韩国近代史特别是开化问题研究中,无论所谓“挑战—应战(challenge-response)”的视角,还是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及其他诸视角,一般是以金玉均等激进开化派及甲申政变等变革作为研究的焦点。尽管如此,李光麟先生认为:“必须摆脱固定观念,从自由的立场出发拓宽视野。惟其如此,方能认识开化思想的多样性和开化运动的广泛性。”“因为在没有参与甲申政变的人中不无给予国民重大影响的开化思想家,从他们推进的事业中可以看到开化运动的真实面貌。在开化思想家中既有与金玉均一派相同的激进派,但不容忽视的是也有稳健派。绝不能简单地将与金玉均等不同步调的人打上保守派的烙印,将与金玉均等无关的事业全部定性为反动的。”惟其采取如此研究视角,李光麟先生以诸多在一般研究中默默无闻的人物及其思想、活动作为深入探讨的对象,将其推到历史活动的前台,揭示了韩国近代开化的广阔而全面的形象。这种研究态度,或许是现在津津乐道所谓重大事件和领袖人物的学人所应该思考和借鉴的。历史毕竟不仅仅是点和线,而是涓流汇成的海洋。

其二,关于资料的收集和运用。在学术研究——无论是自然工程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恢宏的理论架构固然重要,缜密的实证研究更是不可缺少;立论只有建立在充实的资料基础上,才会客观公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韩国开化史研究》各篇论文中,李光麟先生不仅广泛参考各种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中、英、韩、日等四种语言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档案材料、外交文书、报刊文献等;更难能可贵之处是,他还自觉且得心应手地运用如今备受重视的口述史学的视角,充分采用关系人物的访谈记录,以补文字记录之不足或互为佐证。惟其如此旁征博引,他能够高屋建瓴且令人信服地展开关于韩国近代开化运动及其人物的历史画卷。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外国学者仿佛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个风尘仆仆的学者是否会令某些不注重实证资料,而只是急功近利地制造“泡沫文化”乃至“泡沫学术”的浮躁者深感羞愧和无地自容呢?就朝鲜半岛的历史而言,仅汉文资料即堪称汗牛充栋,遑论其他语言的材料。如何最大限度地收集和运用这类资料并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造就中国特色、国际水准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无疑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前辈大师的挥点令人神往,难道现代学人就缺少后浪推前浪的勇气吗?!

其三,关于东亚的总体研究。这是译者自大学时代学习世界历史,特别是中日两国历史以后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近年涉足朝鲜半岛问题后更为其而心醉神迷。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国外学者不无从东亚整体的角度研究东亚国家历史的,他们积累了颇值借鉴的学术成果,影响较大者如日本学者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华的世界与诸民族》、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美国学者费正清(J. K. Fairbank)《中华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曼卡尔(Mark Mancall)《中国位于中心——三百年之对外政策(China at the Center: 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罗萨比(Morris Rossabi)《对等国家间的中国——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华帝国及其邻国(China among E-

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 - 14th Century*)》, 法国学者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新汉文化圈》, 以及韩国学者全海宗《韩中关系史研究》、高柄翊《东亚交涉史研究》等。中国学者亦曾注意到这种视角, 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杨联升(旅美)《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国史探微》)、黄枝连(香港)《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何芳川(大陆)《华夷秩序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等, 但相比之下是非常落后的, 与中国在东亚世界曾经占据的核心地位和曾经发挥的主动作用极不相称。前近代时期, 东亚确实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由似乎互不相干的方位观、层次观和夷夏观交织而成的区域性世界秩序; 进入西力东渐的近代以后, 这种世界秩序虽然逐渐被冲击、侵蚀而趋向瓦解、崩溃, 但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没有消声匿迹, 而且还在增添新因素之后以某种新形式继续存在。李光麟先生《韩国开化史研究》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点, 即: 韩国近代开化思想和开化运动乃是与中国和日本交互影响而展开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固然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但与之并行的还有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的发展倾向; 在诸多方面, 区域化、本土化甚至可能较之全球化、国际化更具影响力, 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鉴往知来, 曾经作为世界最高文明地区之一而傲立的东亚世界若要重现辉煌, 进而在将来的世界发挥更为主动、积极和关键的作用, 对过去进行认真和客观的总结乃是不可或缺的作业, 尤其对东亚国家的历史学者而言更是不可回避的责任。因此, 从总体史(total history/universe history)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需要超越所谓国家和民族的界线——研究东亚, 这也许可以说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东亚学者必须回应的

挑战之一。

再者,东亚国家同处汉字文化圈,汉字作为共通的信息媒体,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时过境迁,加之朝鲜民族和日本民族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中国、韩国、日本三国(近代之前还有越南)之间在遣词用字等汉文的运用方面已经形成某些差别。《韩国开化史研究》以及诸多引用中国以外的汉文文献的著述,其汉文引文与我国现行的标准汉文存在若干差异,原因即在于此。所以,在利用韩国或日本(以及越南)的汉文资料方面,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望文生义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是必须加以避免的。在《韩国开化史研究》翻译过程中,对韩国语版引用的汉文资料,特别是其中的机构、职官、姓氏等固有名词,均尽量保留原貌;但对不会引起误解和歧义的错讹之处及个别异体字等,亦适当根据现代汉语用法加以订正。如此处理是否妥当,祈请方家不吝教正。

韩国高丽大学东洋史学科丁奎福教授穿针引线,安排本书中文版的翻译;世宗大学人文学院史学科吴星教授是李光麟教授的高足,欣然解答了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热情指导和支持我从事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他自始至终关心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特别是韩国大宇学术财团(Daewoo Educational Foundation)克服重重困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一如既往的援助。对他们的无私帮助和热心奖掖,作为晚学的译者谨表衷心的感谢。

陈 文 寿

一九九九年中秋

于北京大学

中文版序

著者自一九六〇代初起关注韩国开化史,在国内外广泛搜集资料,发表文章。结果得以出版若干部关于开化史的著述,其中《韩国开化史研究》是著者在开化史领域最初刊行的专著。本书一九六九年刊行,一九七四年修订再版;今年,即一九九九年全面修订重版,距初版刊行已有三十年时间。所以,本书堪称是令著者感慨万千的研究著作。特别是一九六〇年代中叶,著者曾作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从事研究活动,此一时期对本书的准备工作帮助极大。

著者将十九世纪后期韩国的开化运动分为稳健开化派和激进开化派加以理解。稳健开化派是以中国的洋务运动为榜样,而激进开化派则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范式。本书主要是以稳健开化派的活动和思想为中心考察开化运动,所以还论及韩国的开化与中国的关系。

适逢中国提议翻译出版本书,这令著者备感荣幸。韩中建交已近十年,许多韩国人和中国人为相互理解而不懈努力。在此时节,著者希望此一并不完美的研究多少能够有助于中国的韩国史研究和韩国认识。

对为本书的翻译而不吝操劳的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杨通方主任和直接承担翻译工作的陈文寿先生,深表感谢。同时,对斡旋翻译的丁奎福教授和百般辛苦的吴星教授、崔起荣教授,以及慨然应允版权的一潮阁韩万年社长和崔在裕专务,诚致谢意。

李 光 麟

一九九九年九月

于 一 山

全订版序

所谓开化如今在韩国已经颇为普遍化,但在本书初版的一九六九年尚未广为人用。著者认为所谓开化,在一八七〇年代与开国、开港同义,一八八〇年代意味着引进西洋学问和技术以谋求国家富强,一八九〇年代则是倡导国权和民权。即:开化在韩国历史上经历了如此三个阶段。

一九七〇年本书获得韩国日报社主管的出版文化奖著作奖,感慨万千。现在想来本书似乎算不了什么,只是徒增喧哗而已。所幸最近依然有人给予本书好评,对此深表感谢。

三十年前出版的东西,今天来看令人不满意之处不少。本书原来是作为西江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究专刊第二辑出版的,一九七四年刊行修订增补版。现在再次修订出版,但依然不是十分满意。只是利用新收集和发掘的资料进行部分修订和补充,新增“内衙门的设置及其机能”一文。该文是十年前撰写的,但终无机会发表。因其内容与开化有关,故决定利用重新制版的机会补入本书。

吴星先生和崔起荣先生为出版本书百般操劳,没有他们两位本书是不可能重新出版的。

与上次不同,此次除固有名词和资料外,本书许多部分均改为韩语,以便于阅读。感谢徐珍教氏和西江大学研究生院史学科学学生们运用电脑惠成此项工作。

最后对欣然同意出版已成绝版之本书的韩万年社长和

崔在裕专务以及编辑部诸位,深表谢意。

李 光 麟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于 一 山

修 订 版 序

本书最初问世是一九六九年七月,五年的岁月不觉中已经过去。在此期间一般民众对开化史的关注与日俱增,本书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再版。这出乎著者意料之外,虽然不无欣喜之情,但实际上也颇为苦恼。因为在此期间学术界发掘了许多本书未能利用的史料,而且著者对许多部分也已提出不同于前的新见解,所以必须加以修订。

在此次刊行新版过程中,幸蒙出版社同意修订。于是试以新史料为基础添加新看法,随处进行修订。特别是对“《海国图志》之传入韩国及其影响”和“李树廷其人及其活动”两篇论文做了较多修改,另外新增了“《易言》与韩国的开化思想”这篇论文。《易言》是对一八八〇年代前半期开化思想的展开造成巨大影响的著作,我相信这篇论文将能充分地补充本书的内容。

尽管如此修订和补充,但完稿后发现依然还有许多令人不意满之处。当然通过一次修订是难于期待尽善尽美的,希望能够再次获得机会进行修订。我时刻准备着的。

著 者

一九七四年二月

序

本书是著者最近几年在学术杂志已发表的论文和新撰写的论文編集而成的。因为最初未曾设想出版单行本,所以各篇论文间不仅互相重复者有之,而且观点不一致者亦有之。但作为著者学术历程的产物,均原文照录。

本书收录的论文探讨一八八〇年代开化问题。对于该时代的开化问题,过去已有不少人做过探讨,最近许多人特别将其与众说纷纭的近代化问题相联系加以研究。但在笔者看来,大部分研究似乎集中在金玉均与甲申政变。毋庸置疑,金玉均是当时代表性的先觉者,甲申政变是以其为核心的运动的绝顶,因而关于金玉均其人和甲申政变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应该稍微拓宽视野。

因为在没有参与甲申政变的人中不无给予国民重大影响的开化思想家,从他们推进的事业中可以看到开化运动的真实面貌。在开化思想家中,既有与金玉均一派相同的激进派,但不容忽视的是也有稳健派。绝不能简单地将与金玉均等不同步调的人打上保守派的烙印,将与金玉均等无关的事业全部定性为反动的。虽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似乎是非常划一的,无视稳健派开化思想家的存在及其见解。

总之,为正确把握一八八〇年代的开化思想和开化运

动,必须摆脱固定观念,从自由的立场出发拓宽视野。惟其如此,方能认识开化思想的多样性和开化运动的广泛性。这是著者探讨开化问题的研究态度。虽然尝试以这种态度立论撰文,但是否达成目标尚不能定论。因此,本书收录的论文只是提出存在此类问题而已。

坦率地说,目前还未达到刊行论文集的阶段,只是拿出蛮勇尝试着手。如果没有如下研究机构和人士无私的帮助和鼓励,本书是绝不可能问梓的。首先,本书收录的多篇论文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年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即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惠予学习机会期间准备的。倘若没有充分的时间参考该学社图书馆充栋的资料,此项研究终难进行。对哈佛燕京学社惠赐学习机会,深表感谢。另外,对在申请出版本书时不吝给予财政支持的东亚文化研究委员会理事长金载元博士及诸位理事、干事,诚致谢意。对周围不断给予鼓励的李基白教授及本大学史学科诸位教授,对不顾繁忙编译英文提要的金贞世教授,对阅读全部书稿并提出许多建议的权五悖、金烈圭教授,对协助校订和编制索引的金炳旭、权延雄君,以及一潮阁编辑部的诸位,深表感谢。

最后对在困难的出版形势下慨然出版本书的一潮阁韩万年社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 者

一九六九年七月